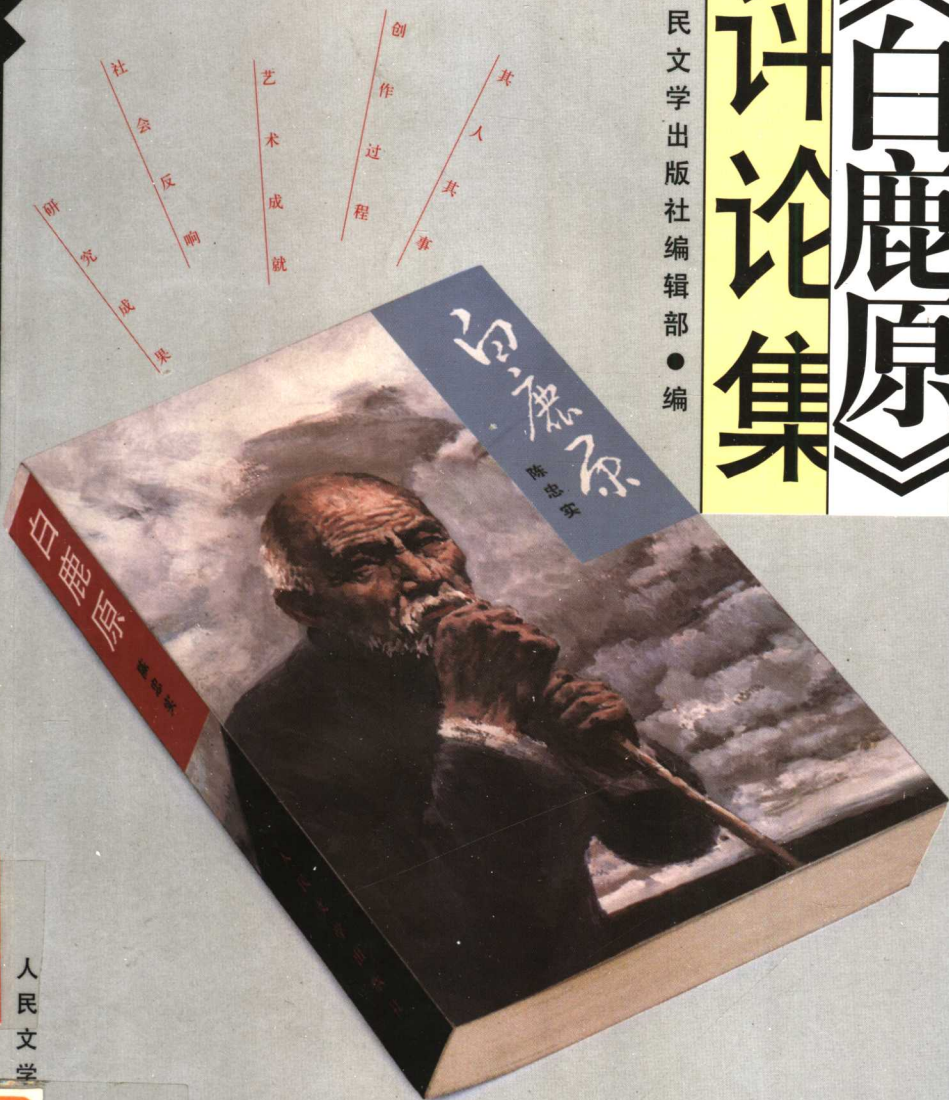


《白鹿原》 评论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编



人民文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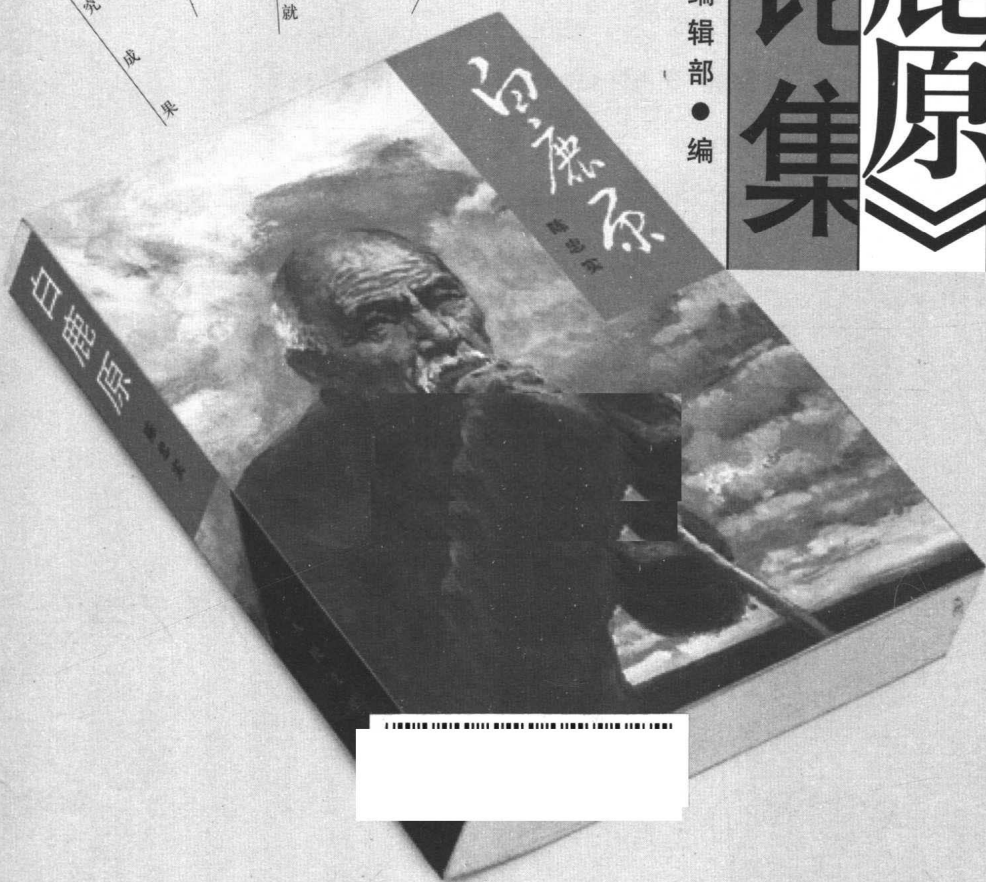
《白鹿原》 评论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编

其
人
其
事
创
作
过
程

艺
术
成
就

社
会
反
响
研
究
成
果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白鹿原》评论集/多人著.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4 重印

ISBN 7-02-003207-9

I. 白… II. 多… III. 长篇小说-文学评论-中国
IV. I207.4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24105 号

装帧设计:何 婷

责任校对:李建军

责任印制:王景林

《白鹿原》评论集

Bai Lu Yuan Ping Lun Ji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编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346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5 插页 2

2000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03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3001-5000

ISBN 7-02-003207-9/B·186

定价 21.00 元

序

陈忠实的《白鹿原》，是上一世纪九十年代，中国长篇小说创作的重要收获之一，能够反映那一时期小说艺术所达到的最高水平。把这部作品放在整个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大格局里考量，无论就其思想容量还是就其审美境界而言，都有其独特的、无可取代的地位。即使与当代世界小说创作中的那些著名作品比，《白鹿原》也应该说是独标一帜的。因此，早就该有一本关于它的评论专集出版了。

—

好的作品，是经得起反复阅读，反复评论的，包括否定性的批评。早在 1993 年《白鹿原》问世之初，就好评如潮，不仅评论界以一种显然久违了的热情表示了肯定与称赞，而且广大读者争相购买、传阅、议论，新闻媒体也好不容易找到了做文章的题目，一时间形成了所谓“陕军东征”的热门话题。当然，也存在着争议，有些不同看法，这本来是很正常的。因为，无论是比较专业的文学批评，还是一般读者的鉴赏，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由于各人的出发点不同，阅读时的具体心境不同，其关注的方面和经由审美体验而得出的判断，也就难

免相异,乃至相反。而一部好的作品价值的论定,也正是在这许多相同、相近、相异和相悖的体验与判断的合力方向上最终完成的。这似乎是一条铁则,《白鹿原》也不例外。

“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七年,在无限流逝的时间的长河中,也许不过是短暂的一瞬,但它足以使数以百计、千计的平庸之作被忘记得不留痕迹,但《白鹿原》依旧作为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的对象,作为一个沉稳的、凝重的文化存在,竖立在那里,一任专家学者们去评说,同时,也还在没有读过和已经读过它的读者中流传。这七年中间,它获得了当代中国长篇小说创作的最高奖项茅盾文学奖,尽管那条件是作者必须作某些在我看来并非绝对必要的删削、改动;另外,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评选,它也排名榜上。岁月是无情的,同时又是有情的。经过七年岁月的淘洗,山高月小,水落石出,《白鹿原》站住了,也被记住了。它不仅如陈忠实所企盼的那样,成为作家自己的一块精神的“枕头”,而且也是阅读它的读者们进行文化沉思和神游百年历史梦境的枕头。

人民文学出版社要出一本《白鹿原》评论集,我以为无论对读者领略这部作品的深层意蕴,对研究者作进一步的探讨,抑或对作家本人,都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我举双手赞成。因此,当这本评论集经过先后几位编者多方搜求并最终由李建军编定时,何启治先生打电话给我,命我作序,我便欣然允诺,虽然自认能力有限。

我是在《白鹿原》刚刚刊行问世时就仔细读过这个作品的,作者的笔力和作品的凝重、苍茫,令我折服,让我震惊,一时思绪浪涌,兴感云屯。直觉告诉我,在秦地的柳青、杜鹏程这些当代小说大师之后,陈忠实攀上了一个新的制高点,他同时也大大超越了自己的同辈作家。然而我至今没有写过一篇专论《白鹿原》

的评论,只在北京关于这部作品的研讨会上做过一次不长的发言,另外在一篇关于文学鉴赏的地域文化因素的论文和一篇叫做《“陕军东征”之我见》的文章里作为个例,有所涉及。所以如此,一是我想让自己初读后的纷繁思絮和激越情怀沉淀沉淀;二是在稍长一点的时段里印证自己最初的那些直觉,它们也同样需要接受时间的检验与磨洗。新近,为了写这篇序言,我又重读了《白鹿原》,感觉依旧新颖。那厚重而又极具表现力的语言,那细致而又洗练到让人难以忘怀的细节,那一个个命运独特而又个性突出的人物性格以及他们的命运,那整体的浑厚、苍凉而又深邃得颇带神秘感的地域文化特色,还有那血泪交流、悲剧交叠的沉重的历史氛围,等等,都仍然引我遐思,让我感喟。我坚信它有恒久的艺术魅力,虽然已经有了那么多的评论,我仍然觉得有话可说,我应该相信自己初读时的直觉。

二

收在这本评论集中的文章,有许多在初发表时我就在有关报刊上读过,还有相当一些,过去不曾读过。无论以前是否曾经寓目,这次写序,我都把入选的文字,从头到尾,逐篇读过,并且做了笔记。读完这些评论之后,我有这样一些突出感受:其一,《白鹿原》以其丰厚的内蕴,包括思想的、文化的、政治的、伦理的、社会历史的、民俗风习的、人情人性的等等,还有相当成熟的艺术技巧,包括结构、叙述、语言运用等等,为批评家们提供了评说的对象,供他们开掘、阐释、发挥。评说的角度是多方位、多层次、多侧面的,同时也是深入肌理的。这说明《白鹿原》是经得起批评的,它没有被有分量的批评压碎,而是在这些批评中更见光华。其二,这本评论集中所收的文章,并非《白鹿原》评论的全

部,而是选收。尽管水平互见参差,但多数言之有物,持之有故,足备一家之说,能够从中见出九十年代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在具体作品的评论上所可能达到的境界。其三,可以明显看出,虽然评论对象是同一个《白鹿原》,但批评家的个性差异是相当大的,各人的才性、气质、行文风格自不必说,就是批评观念,批评方法,批评标准也相当不同,因而就在总体上形成了一种多元互补的评论格局。这种格局,恰好是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的多元大格局在一部具体作品评论中的缩微展示,可以以小见大。其四,《白鹿原》是很难说尽的,尽管这个集子选收了四十余篇评论和阐释文章,但还有一些重要的方面,没有涉及到,或虽有涉及却缺乏必要的深度和力度。这说明,对《白鹿原》的研究,还大有可以深入的余地和可以拓展的空间。其五,《白鹿原》的接受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它的艺术审美价值,文化历史价值和思想认知价值的基本上被承认,它的终于能在上一世纪中国长篇艺术精品长廊里占有一个公认的位置,广大读者的欢迎固然是最重要的原因,但出版社的力荐,评论界的卓有见地的阐释与评价,则尤其功不可没。

收在本书中的首篇评论是雷达的《废墟上的精魂》。这篇文章,理路沉雄劲锐,穿透力极好,写得华滋勃郁,情文并茂,且论证分析,多有独到见地,能够发人所未发,见人所难见,可以说是第一篇给了《白鹿原》以系统全面的准确评价的文章。这篇文章,不仅以其准确的评价,对于一般读者的阅读,起了很好的引导作用,许多见解至今未被超越,而且相当真实地记录了批评主体在欣赏作品时所体验到的巨大的震撼和魅力。好的评论文章,当然能够从中见出对批评对象的准确把握,但这也同时未始不可以从中见出批评家本人的学力,阅历,眼光和识断。《废墟上的精魂》正是如此。职业的评论家,固然有一双特别挑剔的眼

睛,但如果遇到好的作品,总会有一种难以抑制的兴奋,并且会在这一兴奋中迅速建立起与作家作品的交流关系,激活自己相对应的知识积累和人生体验,形成共鸣和共振,于是万途竞萌,灵感纷至沓来,秉笔而书,便有了好的批评文字。我敢断言,雷达的《白鹿原》论正是在类似于这样的昂扬状态下形诸笔墨的。评论的水平,不是评论对象的水平,而是评论家的水平,也就是说敏锐地捕捉对象和准确地把握对象的能力,正足以见出评论家的实力。在我所读过的雷达的作家作品论中,这篇《废墟上的精魂》是很有代表性的,属于他的上乘之作。正是《白鹿原》的成功和出现,为如雷达这样颇具实力的评论家们提供了对象,提供了驰骋才思的空间。这样,我们便在《白鹿原》的评论中,看到了当代中国几代批评家的一次小小的汇集,一次实力和水平的展示,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如果说,《白鹿原》能够反映九十年代我国文学创作所达到的水平,那么,围绕《白鹿原》而形成的这道评论的风景线,也能够反映我国当代文学批评所达到的水平。是否果真如此,读者不妨展卷玩味,鉴赏。

三

朱寨称《白鹿原》为“扛鼎之作”。鼎乃国之重器,扛鼎,誉其举重的神力。朱寨是当代文学批评界公认为德高望重的前辈,他有开阔的视野和广博的参照,因而,他的这个评价就颇具权威性。其实,绝大多数有关《白鹿原》的精彩评论,只要说到点子上,触及要害处,都无不证明了他的上述论断。

世纪之末,中国的文化思想界有一股反思的潮流,其反思的对象以中华民族的百年历史行程为主,涉及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宗教、军事、道德、学术等几乎所有社会生活的领域,但反思

的主体始终是以知识界,即我们这个民族专司思考的群体,为骨干,为中坚的。这股反思的潮流,初起于七十年代末“文革”结束不久。就是说,它是被一场持续十年的人为的浩劫提上日程的。当其初起之时,是以接续伤痕文学并很快漫卷文坛的“反思文学”为先导的。到八十年代中期,这种反思开始突破纯政治的眼界,有了更多的文化方面的探究与扣问,甚至出现了相当自觉的文化传统的溯源,这就在文学潮流上衍变出了名噪一时的“文化寻根”小说。进入九十年代,由于历史发展的某些特殊的条件,再加上新旧世纪之交面临的种种机遇和挑战,以及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回顾与前瞻的心理趋向,知识界的反思,逐步向更广阔的学术领域扩展,而文学的反思,也仿佛是总结了、综合了七十年代反思文学和八十年代“文化寻根”小说的成果,向更深邃、更幽微的历史生活的层面突进了。《白鹿原》就是这一反思潮流的最重要的代表之一。单以小说而论,在它之前面世的王蒙的《活动变人形》,张炜的《古船》,在它之后面世的王蒙的“季节系列”,刘心武的《四牌楼》,赵德发的《缱绻与决绝》,李佩甫的《羊的门》等,都具有明显的反思性质。反思,必然要变换角度,变换评价的观念和标准,不可能完全站在事情发生的当时的立场上。就时间的跨度而言,《白鹿原》的主要故事都发生在上一世纪的前五十年,只有少数地方提到六十年代的“文革”。类似的题材,《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红旗谱》等,都涉及过。但《白鹿原》写出了新意。它虽然仍有政治的视角,但却不再拘泥于原先的政治框架和僵化观念,而且超越了事件发生当时的狭隘的党派意识。更重要的是作家有了更为开阔的大文化的视野,在这样的视野之下,许多过去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的东西,充实到艺术的画卷中来了,许多过去根本不可能看到的那些深隐的,乃至多少显得神秘的层面、因素和意义,终于开掘出来了。

在我看来,这就是《白鹿原》能够给人以震撼,让人耳目一新的重要原因了。“扛鼎”之议,首先与此有关。因此,许多有眼光的评论家,都注意到了《白鹿原》的这种变换角度的反思的特点。雷达为了说明这一点,还专门把《白鹿原》和《艳阳天》作了对照的分析和评论。指出浩然因为事事、处处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挂钩,而“不知遗漏了多少文化意蕴和精神空间”。王仲生《民族秘史的扣询和构筑》,洋洋万言,更是把反思作为自己展开全部论述的一个基本支点。王仲生既然把反思提到如此重要的地位上来对待,他就不能不首先着眼于创作主体的分析。他认为,作家是站在一个现代的立足点上来进行反思的,处于这一反思的中心的,始终是人的命运。这样,他就从《白鹿原》叙事中捕捉到了更为根本、更为要害的民族生存问题。在他看来,民族生存问题的思考与探究,既是《白鹿原》反思的出发点,也是它的归宿点。而王仲生也正是从“民族生存的历史反思”,“民族生存的文化反思”,“民族生存的生命反思”这样三个不同的角度,支撑起他解读《白鹿原》的理性架构。评论家在这里既评价着作家的反思,同时也是伴随作家而进行着他自己的反思。评论家的这种由反思而引致的反思,虽说是在作家反思的延长线上,却相互发明,起着一种放大原作品的反思的作用。

关于反思,王仲生还说,陈忠实不是听从既定的结论,并从此结论出发,预设框架,而是立足于自己对生活的解读和反思。其实不止王仲生,其他批评家都是从反思的角度,读出了《白鹿原》的新意,找到自己的兴奋点的。李星的评论文章题为《世纪末的回眸》,回眸,也就是反思。文学的反思,当然离不开理性之光的透析与烛照,但它是审美的,而非论理的。它体现在作家所创造的有血有肉的历史画卷中,渗透于活动在这幅画卷里的一个一个非常具体的人物的命运中,性格中,心理活动和外部行动

中。因此,批评家也像一般读者一样,在《白鹿原》中首先看到的是作家笔下的人物及其命运,而反思的性质及意义,则是从对人物性格及其命运的解析中读出的。比如李星就从陈忠实的同时也可以说是他自己的“世纪回眸”中读出了“白嘉轩就是几千年中国宗法封建文化所造就的一个人格的典型”;读出了“白嘉轩是陈忠实贡献于中国和世界的中国家族文化的最后一位族长,也是最后一个男子汉。在他身上包容了伟大的中国文化传统全部的价值——既有正面,也有负面”。确实,白嘉轩是读者翻开《白鹿原》所碰到的第一个人物,也很可能是读完《白鹿原》给他留下难忘印象的第一个人物。雷达的感受与李星接近,他说白嘉轩实际上是作者要写的人格神,他看出了这个人物身上传统文化的积淀,更看出了人物身上的悲剧性的矛盾。

揭示出白嘉轩性格和命运在百年历史行程中的深层矛盾,就会很自然地触及作家自身的文化立场,所以雷达说:“我始终认为,陈忠实《白鹿原》中的文化立场和价值观念是充满矛盾的:他既在批判,又在赞赏;既在鞭挞,又在挽悼;他既看到传统文化是现代文明的路障,又对传统文化人格的魅力依恋不舍。”这是一个表述得很深刻的见解,用这样的眼光分析与评价除白嘉轩以外的其他写得有特色、见光彩的人物,如田小娥、黑娃、鹿子霖、朱先生、冷先生、鹿三等,也都无不切合。

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矛盾呢?我以为,作家文化价值取向上的这一矛盾不是凭空产生的,既有其历史的根据,更有其现实的根据。从历史的根据来看,陈忠实在《白鹿原》里面对的是二十世纪前半世纪的历史生活,而他的立足点却站在世纪之末。这就是说,实写的前五十年是包含了后五十年历史生活的参照和文化观念的演进的。如果前推五十年,在前半个世纪刚结束时,《白鹿原》这样的作品,是不可能出现的。因为整个二十世

纪,都是中华民族从宗法的封建专制的农耕文明,走向现代文明的转折期,过渡期。在这段时间内,社会现实中充满了新与旧的冲突。一方面是产生于农耕社会的传统文化在外来的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下不可避免的解体,另一方面又是这种文化作为一种历史的遗产的顽强存在。但它的必然走向没落的命运,却也是注定了的,无法挽回的。不过,一种古老文明的走向没落和解体,是因为它在总体上已经变得不合时宜,并不是说它已经没有了任何带有某种恒久性的可供后来者吸收与借鉴的因素。然而,在非常具体的冲突中,对立的双方都容易取一种极端的、绝对的态度。以传统文化中的道德为例,它既有如“五四”运动的主将们所判定的“礼教吃人”的一面,也有如在“仁义白鹿村”的族长白嘉轩身上表现出来的被朱寨称为“忠诚刚烈坚毅直朴的灵光神韵”。以个人品格而论,他、朱先生、鹿三,都有许多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仍然应该被肯定的东西。文学的反思,是从历史实际出发的,不是从抽象的政治或文化理念出发的,而历史本身就充满了矛盾,怎么能指望作家的观念变成单一的无矛盾的呢?《白鹿原》的力量,恰恰在于它非常真实地提供了像生活本身一样充满了矛盾的历史画卷,它的这种矛盾性和复杂性,就使得不同的读者,不同的批评家,可以对它进行多方面的解读。

从现实生活的根据来看,我们正在经历二十世纪中叶以来最为深刻的社会变革。这场变革已经并将继续改变人们的物质生活方式和精神生活方式。有人称这场变革为社会转型,虽表述小有差异,但所指却是同一个现实历史过程。这一过程始于“文革”过后的七十年代末,是从救治“文革”造成的灾难和反省导致“文革”的那些左的思想观念以及政策举措开始的。从政治上,“文革”是一次全面的封建专制主义的复辟,在文化上,则是在反对所谓“封、资、修”的旗号下对于包括本民族在内的人类

所创造的一切有价值的文化传统和精神遗产的彻底破坏,彻底否定。因此,当人们从“文革”的狂热中清醒过来,进行反思并纠正那些极左的偏颇和错误的时候,重新肯定传统文化中的有价值的东西,就是必然的了。但在八十年代,由于纠正了长期闭关锁国的方针,打开了通向外部世界的窗户,出现了自“五四”以来引进和介绍外来文化思想的热潮。这种引进,作为参照物,作为它山之石,当然是必要的,然而却也多少掩盖了对本民族文化传统的重视。进入九十年代,在引进外来文化思想流派的热潮稍稍平静下来之后,学术界,也包括艺术界,在思考问题、建构新的价值观念体系时,才进一步认识到,一切异质文化的借鉴与吸纳,都必须立足于对本民族的文化传统的承续、改造和出新。然而这里又存在着巨大的陷阱。传统固然有其恒久性的价值,但其负面也同样具有不容忽视的惯性和惰力,而后者又极不易分辨,所以,稍不留意,就会落入文化保守主义的陷阱。再加上社会变革期新旧矛盾的交织,旧的价值体系在崩坍,而新的价值体系一时又难于建立起来,还有某些局部的无序和混乱,这就更增加了作家把握生活,作出判断的矛盾性和复杂性。但陈忠实毕竟把真实的画面呈现给了读者,他虽然给予朱先生以理想化的传统文化品格,但雷达还是把这个人物形象视为农业文明的哲学代表,认为这样的价值取向“毕竟不是中华文化的当代出路”。这就既揭示了这个人物的价值和意义,又没有忘记其明显的历史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当然不仅仅是人物的,更是作者的和时代的。

四

《白鹿原》是以一处实有的地名作了书名的。白鹿原,即霸

上,又称霸陵原,在陕西蓝田县西,灞水行经原下。相传周平王时有白鹿出于此,故名。查唐杜预《通志》,“京兆府·万年”注:“有白鹿原,亦谓之霸上,霸陵也”,按,霸陵为汉文帝刘恒的陵寝。霸陵原之得名者以此。关于这个白鹿原,陈忠实《答李星问》中有如下一段说明:“西安东郊确有一道原叫白鹿原,这道原东西长约七、八十华里,南北宽约四、五十华里,北面坡下有一道灞河,西部原坡下也有一条河叫浐河,这两条水围绕着也滋润着这道古原,所以我写的《白鹿原》有一条滋水和润河。这道原南部便是终南山,即秦岭。地理上的白鹿原在辛亥革命前分属蓝田、长安和咸宁三县分割辖管,其中蓝田辖管面积最大,现在仍分属蓝田、长安和灞桥二县(区),我在蓝田、长安和咸宁县志上都查到了这个原和那个神奇的关于白鹿的传说。蓝田县志记载:‘有白鹿游于西原。’白鹿原在县城西边,所以称西原,时间在周。取于‘竹书纪年’史料。”在陈忠实的《白鹿原》里,这道亿万斯年就一直耸立于灞水之滨,展延于终南山下的古原,既是一个地理的概念,是白、鹿两大家族繁衍生息的地方,又是一个文化的概念,是寄托了作家某种象征性意蕴的载体,或者说,它本身就是是一个巨大的文化象征。

在作品中,作家叙述过关于白鹿的渺远的传说。传说是美丽的,迷人的,有几分神秘,甚至与作家的人格理想相表里,贯穿于作品之中。李建军在《一部令人震撼的民族秘史》中,专门对白鹿意象的象征意义进行了解读,认为这个象征增加了作品的诗意。他还把陈忠实的白鹿意象与艾特玛托夫笔下的白鹿意象作了对照,并且联想到历代帝王的鹿苑和所谓“中原逐鹿”之类进行了发挥,是很能见出一种学术想象力的神采的。白鹿原作为一个具体的地理存在,有其临水的高岸,上部平舒逶迤的地貌,渐次抬升以至终南山麓,这个地理的存在比白鹿的传说,白

鹿原的得名,都要远为长久得多。但白鹿的传说是一种文化,因而古原之以白鹿为名,也就带有明显的地域文化的性质了。当然,作为地域文化的载体或象征,白鹿原包含的不只是白鹿意象这一点,更重要的是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在其全部活动中所形成的传统、习俗、心理、生存方式和思维方式等等。

现在看来,有关《白鹿原》的评论,绝大多数都采取了文化的视角,着重于开掘这部作品所包蕴的民族传统文化的质素,在这方面也确有不少相当精到的见地。然而,《白鹿原》提供的并非一种泛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的画卷,而是有非常具体的地域特色的民族文化传统的画卷。相当一批评论家的评论,都注意到了这一点,因而有所论列。朱寨说:“作品的乡土气息格外浓郁。对于乡土气息的描写不是外在的,而是渗透在日常生活的细节中,所以格外沁人心脾。”也许正是基于这样的感受,他认为,“作者更应欣慰的是:给孕育和哺养自己的土地和人民,奉献了赤子的回报”。田长山的《犁开深沉的土层》着眼于从关中农民的文化心理出发,展开对作品的解读与评价。这是一篇有力度的地域文化批评,涉及到关中民俗文化的许多方面。说到礼俗时,他有这样的议论:“正是这种以礼俗为核心,为支柱的乡风民俗孕育出关中人特有的心理品格:讲礼仪、重然诺、厚重而不木讷、刚烈而不暴戾,向往文化教育以‘耕读传家’为美德世风,为理想家教,通情达理明晓大义。”孙豹隐在《瑰丽雄浑的历史画卷》一文里所取的观察角度与田长山相近,认为《白鹿原》“剖析这块土地上的人种特点、生存形态、社会性格,使作品散发出相当的文化韵味,呈现出一幅关中历史、文化艺术、民情风俗长卷”,说是“陈忠实通过淋漓尽致地表现家乡的地域特征、农事耕作、文化遗迹、村规民约、婚丧嫁娶、节日礼仪、世态人情、伦理道德、情趣品性,摇曳过一幕幕风俗画、风景画、生活画的镜头,进而集纳成具

有独特地域文化的自然景观、人文景观、历史景观,进而描绘出乡土气息与时代氛围交融一体的典型环境”。此外,雷达、黄国柱、李小巴、董之林等人的文章也都多少说到了《白鹿原》的地域文化特色的问题。正因为《白鹿原》展示的历史文化的画卷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才使它更能够体现出某些中华传统文化的普遍意义。

那么,浓郁而又深厚的地域文化特色在《白鹿原》中是怎样体现出来的呢?首先,来自作家处理的这个特殊的题材,来自他在作品中所描写的物象。以环境而论,包括自然景观、人文景观,也包括风声习气、歌谣礼俗等,这些,评论家们显然都注意到了。但是,对于如小说这样的长篇叙事性作品来说,更重要的是与人物的性格有关,而这一点,如果不是空白,至少评论家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与阐释。不少评论只是一般地说到地域文化品格,而落实到具体人物性格的分析上就常常语焉不详了。其实,在《白鹿原》的人物画廊里,如主要人物白嘉轩,智者朱先生,长工鹿三和他的儿子土匪黑娃,医人冷先生,甚至刚烈而又苦命的田小娥,都无不可以作地域文化角度的深入解析。在这些人物中,朱先生似乎是最容易从地域文化角度阐释的人物了。一是他有文化人的身份,是白嘉轩以至黑娃等人物的精神导师,在人们心目中扮演着真正的教父角色;二是作家明确提出了他作为关学传人的学者素养和知识背景。王仲生在分析这个人物形象的典型意义和文化价值时,除了对其作为从封建时代末世转入半封建时代的乡村知识分子的一般情况作了必要的论说外,还对这位半是智者,半是圣人的老夫子的关学背景提了几笔。王仲生追溯到宋代关学鼻祖张载,强调了关学重实践,重经世致用的传统,这是很对的,增加了解读这一人物的文化维度和学术维度。但问题在于,为什么关学重实学,而未沉溺于后来理学家

空谈心性的泥淖,本身就需要解释,需要说明。以张载而论,他固然重实学,重经世致用,但也有明显的文化保守主义的复古倾向。从重实学、重经世致用上看,其道统乃儒者的积极入世观念。然而,关学作为一个产生于周秦故地的儒学学派来说,传统儒者的道统,并不是它的唯一的思想资源。白鹿原地处周秦故地的腹部,这一带地方是华夏辉煌的农耕文明的主要发祥地和摇篮,同时,也是这一文明在其发展的鼎盛期的中心。这一带地处北国,水深土厚,属大陆型气候,雨量并不丰沛,生产条件相对艰苦,因而自古以来民风淳厚、尚实,这一点在文学上也表现得非常明显。这只要对比一下《诗经》中的秦风、豳风与产生于南国的《楚辞》,就看得相当清楚了。正因为这种尚实的文化传统的源远流长,所以不仅张载如此,而且在始于张载的关学学中,这一特点可以说是一以贯之的。以明清之际被康熙帝玄烨誉为“关中大儒”的二曲先生李颀为例,他也是以重实学、重经世致用而流誉当世的。早年颇为重视各项实际学问,著述甚丰。晚年闭门谢客,反身自修,主“悔过自新”之说,仅与流寓关中的大学者顾炎武过从密切,而顾的学问,也以尚实为特色。周秦故地孕育出来的尚实的传统,不仅在关学中获得了它的辉煌的学术体现,而且通过关学的传统,强化着这一地域本来就有的民间的尚实文化传统。自金入元的大学者、诗人元好问说:“关中风土完厚,民质直而尚义。风声习气,歌谣慷慨,且有秦汉之旧。”其着眼点就不只是关学,而更看重的是“秦汉之旧”,在朱先生身上,如果说这种尚实的特点,由于作者对他的理想化的,有时甚至是半仙半道的艺术处理,而不无飘逸之处的话,那么,白嘉轩则表现得尤其分明。

文化,特别是地域文化,它的存在,一旦形成一种传统,其对于人的性格、心理,乃至思想、学术的影响与熏染,都是巨大的。